【义乌发展经验研究专题】

义乌发展经验中的数字贸易转型实践及启示*

王颂吉 李彤

摘 要：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的“义乌发展经验”，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义乌从传统贸易转型发展数字贸易的经验尤其具有借鉴价值。文章系统梳理义乌国际商贸平台的跃迁历程，深入剖析义乌在贸易撮合、贸易执行和贸易服务三个环节的数字化转型逻辑，提炼出技术赋能、市场选择、制度适配三个方面的数字贸易转型动力机制。义乌数字贸易转型的实践经验表明，数字贸易不是简单的技术替代，而是实体市场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是经营主体适应、有效市场引导、有为政府保障的系统性重构，这一经验为其他地区因地制宜探索数字贸易转型发展路径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义乌发展经验；数字贸易；数字经济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6)05-0054-11 **收稿日期**：2026-06-08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百年经济思想及其经验启示研究”（20220025）；西北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人工智能赋能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链风险预警研究”（AI2026004）。

作者简介：王颂吉，男，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 710127）。

李彤，女，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生（西安 710127）。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义乌小商品市场享誉全球，2025年外贸出口额居全国县域首位。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强调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四十多年来，义乌坚持“兴商建市”战略，迭代升级小商品交易市场，形成了巨大的小商品贸易辐射能力。近年来，义乌依托长期积累的实体市场优势，通过数字技术对贸易全链条进行系统性改造，成功实现了从传统贸易向数字贸易的转型升级，这为其他地区加快发展数字贸易提供了重要借鉴。

数字贸易是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国际贸易发展新趋势。2024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促进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助力建设数字中国和贸易强国。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创新发展数字贸易。在中央政策指引下，各地积极探索发展数字贸易，学界研究也不断深入。现有文献主要围绕数字贸易的驱动因素与经济效应展开研究。就数字贸易发展的驱动因素而言，数字基础设施是其运行的物质基础。把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应用于贸易环节，可以在竞争条件、要素流动和贸易条件三个维度产生技术扩散效应，进而提升对外贸易质量（钞小静等，2020）。制度规则与政策环境对发展数字贸易也具有重要作用，区域贸易协定中的数字贸易规则显著影响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贸易方式数字化规则的促进作用大于贸易对象数字化规则（侯俊军等，2023）。学术界从微观、中观、宏观等不同层

面研究了数字贸易的经济效应。微观层面，数字贸易通过促进研发要素跨境流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管理专业化，提升企业创新水平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朱勤等，2024）；中观层面，数字贸易显著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姚战琪，2024；裴桂芬等，2024），并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知识吸收、增强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韧性（伍先福等，2025）；宏观层面，数字贸易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马野青等，2024），增强经济韧性（孔希贤等，2024），赋能国家创新体系与新型城镇化（郑佳宁等，2025），并且对全球收入不平等产生影响（张东明等，2025）。学术界对数字贸易的实证研究较为充分，但缺乏对传统贸易向数字贸易转型的微观机制与动态过程的深入剖析。义乌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深入研究义乌从传统贸易向数字贸易转型的实践历程与动力机制，可以为其他地区发展数字贸易提供借鉴。

二、义乌国际商贸平台的发展历程

义乌依托商贸平台不断发展跃迁，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活样本。从1982年简陋的马路市场，到2025年第六代全球数贸中心运营，义乌商贸平台经历了六次迭代：第一代解决“有没有”市场，第二代解决“够不够”摊位，第三代确立全国龙头地位，第四代实现规模化规范化，第五代开启国际化数字化，第六代迈向数字贸易生态。义乌商贸平台的每一次迭代都不是推倒重来，而是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与回应时代需求，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了一条符合义乌实际的商贸流通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

（一）第一代市场：从“鸡毛换糖”到马路市场

义乌市场的起源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末的“鸡毛换糖”货郎担。这种以物易物的流动贸易虽规模微小，却孕育了义乌人的经商传统。1974年前后，义乌稠城镇的县前街出现了季节性小商品市场，但长期处于“半合法”状态。义乌第一代市场诞生于1982年。时年40岁的冯爱倩迫于生计在县城摆摊，却屡遭处罚，遂向时任县委书记的谢高华当面质询：为何不允许老百姓摆摊。义乌县委立足群众实际需求，果断决策开放小商品市场。1982年9月，义乌湖清门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开业，这个市场实为一条露天马路，以水泥板搭成简易摊位。条件虽然简陋，其意义却极为深远，它标志着政府为民间贸易活动赋予了合法性。1984年，义乌小商品市场成交额达到2321万元，商品销往周边县市[①]。总体而言，义乌第一代市场使摆摊经营从“地下”走向合法，为后续发展打开了空间。

（二）第二代市场：从棚架市场到区域商贸中心

第一代市场投入运营后，市场需求增长迅速，原有摊位数量面临饱和压力。为此，义乌在太祖殿一带建成了简易棚架结构的第二代市场。新市场投入使用后，经营主体和采购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其中外地客商成为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间推移，该市场显现出明显的“洼地效应”，大批原本在周边及外地经营小商品的个体工商户陆续向义乌迁移。这一市场集聚现象的动力来自义乌在商品汇聚、信息传播与交通物流等方面的比较优势。这一阶段，市场的商品交易规模大幅提升，其辐射与销售网络由早期的周边县市进一步拓展至省外区域。总体而言，义乌第二代市场有效缓解了市场建设初期实体空间供给紧张的局面，实现了义乌市场向区域性商贸中心的跨越。

（三）第三代市场：从区域集散到全国龙头

随着交易规模不断扩大，第二代市场难以满足交易需求。1985年4月，义乌县政府开展市场发展专题调研，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后提出市场新建方案。1986年9月，第三代义乌小商品市场建成开业，内设4096个固定摊位和1000多个临时摊位，并配套建设工商、税务、邮电、金融等综合服务大楼。此后经过两次扩建，1990年义乌小商品市场占地面积达5.7万平方米，固定摊位增至8503个，另设临时摊位1500个，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专业批发市场[②]。总体而言，这一阶段义乌从地方性商品集散中心发展为全国性商贸枢纽。

（四）第四代市场：从粗放扩张到规范运营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义乌小商品市场粗放式扩张的弊端逐步凸显，零散布局、管理松散、运营无序等问题日益突出，市场建设亟待向规范化转型。面对挑战，义乌启动建设第四代市场，并于1992年建成投用。第四代市场创新推出多项改革举措，实行规范化运营。建设层面，突破以往政府单一拨款的建设模式，创新推行“集资建场”，先后完成两期商户集资建设，有效盘活社会资金。运营管理层面，1993年成立的中国小商品城股份有限公司（商

城集团前身），彻底打破传统行政化管理模式，开启公司化、专业化运营，同时实行“划行规市”等规范化管理制度，统一经营布局、规整经营业态。系列举措落地后，有力扭转了市场粗放无序的发展局面，缓解了政府财政压力，让商户与市场深度绑定、共建共发展。这一阶段，义乌市场从零散摊点的简单集合，升级为布局科学、制度健全、权责清晰、具备独立法人主体的现代化商贸市场，解决了市场规模化发展与规范化运营之间的矛盾，构建起成熟的市场运营管理体系，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专业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筑牢了基础。

（五）第五代市场：从内贸批发到全球贸易

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WTO为义乌打开了国际化通道，互联网普及则为贸易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技术支撑，义乌小商品市场迎来跨越式发展的机遇。第五代市场以义乌国际商贸城为代表，经营面积达640多万平方米，从业人员超过21万人，在册市场主体数突破90万户[③]。这一阶段，义乌商贸市场的发展重心从内贸批发转向外贸，出口额超过内贸额，2010年底义乌市场的商品出口到全世界215个国家和地区，市场外向度超过65%[④]。在此过程中，义乌市场开启数字化转型，推动传统商贸与数字贸易深度融合。2015年义乌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1511亿元[⑤]，2018年义乌获批国家级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2020年义乌商城集团上线义乌小商品城（Chinagoods）平台，为小商品产业链提供线上展示、贸易撮合及供应链管理等服务。总体而言，义乌第五代市场不仅实现了市场规模扩张与国际化跨越，而且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推进了贸易方式的数字化转型。

（六）第六代市场：从数字化应用到智能化生态

随着跨境电商深度渗透、数字贸易新业态加速涌现，传统单一的线上交易、电子通关等数字化工具模式，已难以适配全球客商精细化、高效化、智能化的贸易需求，义乌在此背景下启动建设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2025年10月正式运营。全球数贸中心集市场、商务写字楼、商业街区、公寓、数贸港五大功能于一体，构建了“1+3+N”数贸生态：1个数贸港，Chinagoods、智捷元港、义支付三大核心平台，搭配N项数字赋能场景。相较于第五代市场侧重贸易方式的数字化改造，第六代市场更加注重数字贸易的体系重塑与生态升级，依托人工智能、高速算力、跨境数字基建等新型数字技术，实现商贸交易、供需匹配、跨境流通、品牌运营等全链路智能赋能。

三、义乌数字贸易转型的实践逻辑

跨境贸易流程一般包含前期贸易撮合、中期贸易执行、后期贸易服务三个关键阶段，传统的线下贸易模式在这三个阶段往往存在信息不畅、流程烦琐、服务分散等问题，难以有效适配跨境电商小批量、高频次、全球化的需求。义乌在从传统贸易向数字贸易转型过程中，立足深厚的实体市场发展基础，借助数字技术对传统贸易的全流程进行改造，全面提升了跨境贸易的运行效率（见图1）。其中，贸易撮合数字化解决了传统贸易信息不对称、获客匹配效率低的问题；贸易执行数字化优化通关、物流、仓储等核心履约流程，补齐了传统链条冗长割裂、适配性不足的短板；贸易服务数字化整合各类跨境配套资源，降低了商户出海的资金、合规与运营成本。

（一）贸易撮合数字化

在传统贸易的撮合阶段，义乌商户主要依靠展会、地面推广等方式开发国内外客户，双方从建立联系到达成交易，需经历报价、回盘、样品确认、合同磋商等多轮环节，整个撮合周期长达数周，获客成本高、信息反馈慢。传统贸易撮合模式的本质是“人找货”，买家主动搜寻，卖家被动等待。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贸易撮合效率，义乌利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贸易撮合模式，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供需双方的低成本、实时化连接。

一方面，互联网平台充当数字贸易的中介载体。义乌商户较早开始了电子商务的探索与实践。2011年，义乌获批全国首个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同年阿里巴巴1688义乌产业带频道上线，本地小商品开启规模化线上销售。此后，大批义乌商户入驻速卖通、eBay、亚马逊、敦煌网等跨境电商第三方平台。到2015年，义乌在各类平台的电商账户超17万户，跨境电子商务快递日均出货45万票[⑥]。依托速卖通、亚马逊、eBay等平台，义乌商户将小商品直接推送给全球客商。2020年义乌自建Chinagoods平台正式上线，Chinagoods平台从最初的产品展示工具，逐步发展为集品牌赋能、智创服务、交易撮合于一体的综合性数字平台。2025年，该平台累计注册采购商超过550万人，服务商户6万余家[⑦]。为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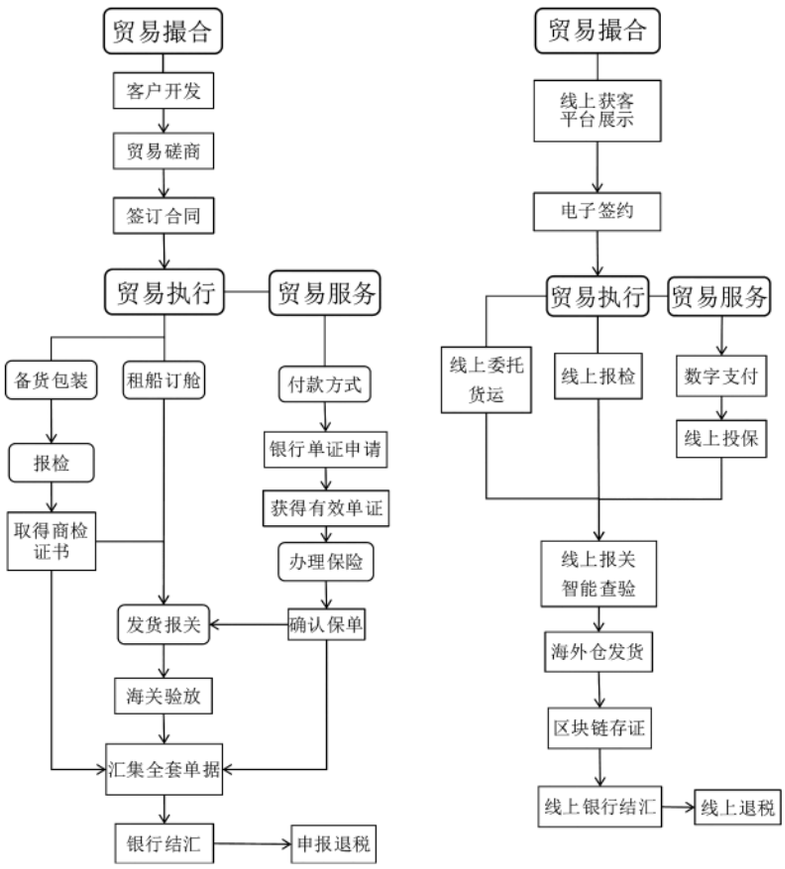

图1　传统贸易与数字贸易流程对比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绘制。

一步拓展市场,义乌主动融入全球数字贸易网络。Chinagoods平台已链接亚马逊、TikTok、阿里巴巴国际站、拼多多、小红书等全球主流电商平台,商户可在平台上“一键上架、多端分销”。依靠互联网平台矩阵,义乌商户大幅降低了开拓海外市场的门槛,商户无须自建独立站、无须精通各国电商规则,即可触达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有效开展线上贸易撮合。

另一方面,AI技术深度嵌入进一步提升了交易匹配效率。2023年起,义乌落地“世界义乌”商贸大模型,该模型集成语言交互、创意设计、内容制作、智能客服等十余项功能模块,打破了跨境沟通的语言障碍,AI设计、AI视频、AI客服等智能工具的应用有效降低了海外营销成本,虚拟直播应用使商户可以同步对接不同地区的采购方。AI智能应用依托算法承接信息流转、语言转换、需求研判等传统的人工环节,在实现规模化交易匹配的同时,持续降低了义乌商户的线上运营和贸易撮合成本。

(二)贸易执行数字化

贸易撮合完成之后进入交付执行环节。在传统的贸易执行模式下,义乌商户面临诸多难题:传统交付流程冗长、主体分散,涵盖备货、报关、物流、保险、结汇等十余项流程,各服务商与监管部门相互独立,信息流转依赖纸质单证,数据互通不够顺畅;传统贸易执行模式主要服务于整柜大批量出口订单,难以适应义乌小商品高频次、小批量的贸易需求。针对以上难题,义乌全面推进贸易执行的数字化改造,围绕通关便利化、海外仓布局、智慧物流体系开展系统性工作,重塑传统履约体系,推动贸易执行环节实现质效升级。

一是通关流程的数字化再造。2010年,义乌小商品出口综合管理信息平台上线,率先开启报关环节电子化申报,商户可线上录入报关基础数据,告别手写纸质单据的传统模式,这成为义乌通关数字化的起点。2011年,义乌开展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工作,配套推进无纸化通关改革。2013年,义乌落地转关无纸化、分类通关等举措,逐步推进单证线上申报,初步实现了报关环节单据电子化流转。为彻底打通多部门数据壁垒,2020年义乌数字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打造了集通关、结算、税务、供应

链服务于一体的国际贸易公共服务平台。依托该平台，义乌全面推行单证电子化申报，报关单、交易清单及各类商事票据均可线上提交，数据互通实现了信息一次录入、多方共享。该平台同步对接海关AI智能审图系统，货物扫描影像实时回传，由人工智能初判后再完成人工复核，将原先数小时的办理时长压缩至分钟级别，显著提升了跨境通关效率。

二是智慧物流的数字化调度。义乌小商品以小批量、高频出货为典型特征，传统跨境物流依靠人工统筹运力与运输路线，零散货物调度的效率偏低，无法匹配小商品贸易的拼箱订单需求。为提升贸易执行效率，2022年义乌依托“智捷元港”数字化履约平台搭建智慧物流调度体系，实现了全流程线上化、智能化运转。该平台整合订舱、制单、物流追踪、费用结算等多项功能，商户可以在线完成全链路操作，大幅简化物流办理流程。依托该平台的智能调度能力，当地货物集拼、干线运输效率显著提升。此外，中欧班列、海铁联运等跨境运力也接入智慧物流调度系统，依托平台完成舱位、箱位、运输班次的动态调配。

三是海外仓的数字化库存管理。义乌早期布局的海外仓仅承担货物存放、简单分拣的基础仓储功能，整体运营高度依赖人工台账、手工盘点，库存更新滞后、数据误差频发。为打通境内销售端与境外仓储端的数据断层，义乌推动全域海外仓上线标准化仓储管理系统（WMS），该系统与1688、速卖通、亚马逊、Chinagoods等线上交易平台以及智捷元港智慧物流调度平台双向数据对接，实现库存实时同步、智能补货预警和一键发货。截至2025年，义乌在全球布局海外仓210个，覆盖61个国家和地区[⑧]，有效提升了国际物流履约服务能力。

（三）贸易服务数字化

贸易服务的数字化转型，解决的是传统模式下服务资源分散、商户对接困难的问题。义乌商户以个体工商户、中小微外贸商家为主，缺少专业涉外运营团队，传统模式下各类外贸配套服务资源分散，制约了义乌商户的跨境经营。义乌以本土Chinagoods数字贸易综合平台为核心载体，整合碎片化的外贸配套资源，搭建覆盖贸易全周期的一体化线上数字服务生态，深度集成跨境结算、权益保护、供应链金融等核心服务，推动各类涉外服务从多主体线下分散办理转向平台一站式集成线上闭环办理，实现了贸易配套服务的系统化、线上化、智能化升级。

一是Chinagoods平台数字化跨境结算与税费服务为商户降本增效。Chinagoods平台接入义乌商城集团持牌自研的“义支付”跨境支付体系，可支持26个币种跨境结算，服务网络覆盖全球170余个国家和地区。该平台与合作银行实现系统直联互通，商户在线签署授权后，可在平台内部一站式完成收汇、结汇、账务查询等全流程操作，大幅压缩跨境资金周转环节。在此基础上，义乌依托数字贸易平台落地跨境电商无票免税、离境即退税专项政策，创新优化退税流程，出口海外仓货物仅凭报关单即可申报退税，无须等待货品实际外销，大幅加快企业资金回笼速度，有效缓解了小微企业跨境经营的现金流压力。

二是数字化合规风控与知识产权维权体系为义乌商户国际化经营提供权益保障支撑。Chinagoods平台集成智能化跨境合规查询模块，打破了传统跨境合规信息获取渠道零散、专业门槛高的弊端，商户可自主在线查询各国关税标准、海外产品认证规范、RCEP原产地规则等核心经营信息，大幅提升跨境合规申报与风险排查效率，有效规避涉外经营合规风险。同时，平台联动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义乌分中心，搭建一站式涉外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体系，为市场主体提供案件动态监测、专业应诉指导、维权费用补助等全链条配套服务。

三是数据驱动的数字化供应链金融模式有效破解跨境商户融资难题。传统商贸金融服务高度依赖固定资产抵押，多数轻资产商户难以获得信贷支持，资金周转受限。Chinagoods平台长期沉淀海量真实的商户交易、物流履约、跨境支付等多维经营数据，为信用评估提供了客观、真实、可溯源的数据支撑。基于平台大数据资源，义乌创新构建“数据增信”融资模式，摒弃传统抵押物审核机制，依托商户数字化经营信用开展授信服务，为商户提供纯信用、低门槛的跨境供应链融资支持。这种数字化金融赋能模式，打通了“贸易交易—数据沉淀—信用增值—金融赋能”的良性发展闭环，有效激发了中小市场主体经营活力。

四、义乌数字贸易转型的动力机制

义乌成功实现数字贸易转型是技术赋能、市场

选择与制度适配三大机制协同作用的结果。技术赋能构成了数字贸易转型的基础条件，新一代信息技术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匹配效率，为义乌由传统贸易转向数字贸易提供了可能；市场选择体现了微观主体的理性响应，在交易成本下降与全球市场机会拓展的双重作用下，义乌商户主动调整行为，实现从传统贸易模式向数字贸易模式的自发转换；制度适配提供必要的外部保障，政府通过政策引导、监管创新与服务优化，减少制度性摩擦，营造了有利于数字贸易转型的制度环境。

（一）技术赋能机制

技术赋能是义乌从传统贸易向数字贸易转型的核心支撑，是打破传统贸易时空限制、提升贸易效率、优化贸易体验的关键动力。信息通信技术、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共同支撑起数字贸易的全流程顺畅运行，为义乌小商品贸易的数字化迭代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底座，推动义乌从“线下实体交易”转向“线上线下融合、全域数字化协同”的贸易新模式。

1.信息通信技术夯实贸易数字传输基础

信息通信技术在数字贸易中的核心功能是搭建交易连接桥梁、保障数据高效传输，破解传统贸易信息传递滞后、沟通成本高、地域限制明显等难题，是义乌数字贸易转型得以顺利推进的技术基础。

信息技术落地应用是义乌数字贸易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其一，义乌持续完善新型通信基建，国际商贸城、全球数贸中心等重点市场全域完成5G布设与光纤改造，为商户线上接单、跨境直播筑牢了数字基础。其二，义乌针对性布局跨境专用通信线路，整合优质带宽资源与智能化运维方案。截至2025年，全球数贸中心超1600家商户接入跨境专线，支撑“跨境直播+供应链+本地化服务”模式运行[⑨]。其三，义乌园区落地中国电信视联网系统，上线AR实景远程验厂服务，依托实时音视频与定点监控设备实现异地沉浸式看厂，降低了采购商实地考察成本，有效提升了供需匹配效率。

2.物联网实现供应链智能管控溯源

物联网是通过传感器、射频识别等技术，将各类物品、设备、场景与互联网连接，实现物品的智能识别、定位、追踪、监控以及信息交换的一种技术体系。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实现了“人、货、场”的全要素互联，打通了义乌跨境贸易全链条的数据采集与追踪，破解了传统贸易的货物监管难、库存管理低效、供应链协同不足等难题。

义乌结合小商品贸易“品类多、批量小、物流周转快”的特点，将物联网技术深度融入数字贸易全流程，重点聚焦物流与市场管理两大场景。在物流领域，依托智慧物流系统，将物联网传感器应用于小商品仓储、运输环节，实现货物周转的实时监控。截至2024年上半年，Chinagoods商城通过智慧物流系统累计出货量达6.2万标准箱[⑩]。在市场管理层面，商贸城布设物联网智能终端，对商铺经营、客流变化、货品库存开展动态数字化管控，以实时数据统筹场内货源调度与物业管理，以精细化数字化管控提升市场运营效率。

3.大数据赋能贸易决策精准匹配

大数据技术是对海量、高增长率、多样化的数据集进行采集、存储、分析、挖掘与应用的技术体系，通过算法模型对数据进行深度处理，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在义乌数字贸易转型实践中，大数据技术应用贯穿贸易全流程，有效提升了经营效率。

义乌以小商品贸易数据为基础推进大数据技术应用，形成了数据要素赋能小商品数字贸易便利化的特色模式，该模式入选国家数据局等部门评选的首批20个“数据要素×”典型案例。2020年义乌搭建小商品数字自贸综合应用平台Chinagoods，整合全球采购商数据、商户经营数据、物流数据等海量信息，通过大数据分析实现供需精准匹配，破解中小微经营主体接单难、出货难等问题。同时，Chinagoods平台嵌入“数据洞察”功能，为商户提供市场潮流分析、产品需求预测等服务，助力商户优化产品供给，缩短产品研发周期，提升市场竞争力。

4.人工智能提升贸易智能运营效能

人工智能是通过模拟人类智能，实现机器的学习、推理、决策、交互等能力的技术体系，涵盖生成式AI、智能算法、机器翻译、数字人等。在义乌数字贸易转型实践中，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广泛且多元，包括智能营销、智能服务、智能设计等，其作用是替代部分重复性人工劳动，提升贸易全流程的智能化水平，降低数字贸易的参与门槛。

义乌聚焦商户实际经营需求，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场景化落地，打造“AI+小商品贸易”的创新生态，引导商户应用AI科技开展国际贸易。2025年义乌

商城集团联合阿里云成功开发“世界义乌”商贸大模型，AI应用覆盖生产设计、内容营销、交易撮合、出海服务等全链条经营场景。其中，“小商AI设计”可一键生成产品图、场景图及海报，将传统模式下1个月的设计周期缩短至7到10天；“小商AI视创”可快速生成多语言营销视频；“小商AI名片”可生成数字人分身，助力商户主动拓客。另外，义乌在市场公共区域部署AI智能交互屏，集成虚拟试戴、AI翻译、导航导购等功能，在核心位置设立“数字化服务中心”，提供一对一技术指导，并定期组织线下培训班，确保商户会用和善用人工智能工具，积极推动AI技术在全市场普及。

（二）市场选择机制

市场选择是义乌数字贸易转型的内生动力机制。它从微观主体的理性决策出发，解释了义乌的商户为何主动从传统贸易转向数字贸易。在数字技术推动下，交易成本的显著下降为数字贸易转型提供了推力，全球市场边界的拓展则创造了强大的外部拉力，广大经营主体的主动学习与创新实践，最终将成本优势和市场机会转化为现实的转型行动。

1.交易成本显著下降提供转型推力

交易成本是市场主体决策的核心因素。在传统贸易模式下，信息搜寻、供需议价、合同缔约、支付结算、物流通关等各个贸易环节均存在较高的时间与人力成本，高昂的交易门槛制约了义乌商户深度参与跨境贸易。在数字技术推动下，各类数字化工具有效简化了贸易流程、压缩了贸易成本。当义乌商户切实感知到数字贸易成本更低、流程更简、效率更高时，主动拥抱数字贸易、推动贸易模式数字化转型就成为市场主体的自发选择。

数字贸易通过平台化撮合、标准化流程和智能化工具，压缩了义乌跨境贸易链条上各环节的成本。电商平台将海量供需信息集中展示，将买卖双方的匹配摩擦降至最低；在线沟通与AI翻译技术消除了语言和时差障碍，大幅缩短了谈判周期；线上支付和数字化单证使资金结算和通关效率成倍提升。在Chinagoods平台落地前，义乌商户拓展海外市场高度依赖线下展会、实地走访等方式，获客成本高、渠道覆盖面窄。平台赋能后，义乌商户仅需完成一次商品信息上架，即可凭借平台流量触达全域注册采购商，持续降低跨境获客的边际成本。同时，AI智能翻译等数字化工具替代了传统人工翻译、反复邮件沟通的低效模式，极大缩减了义乌商户跨境沟通的人力与时间成本。数字技术带来的交易成本下降，为义乌商户的数字贸易转型提供了强劲推动力。

2.全球市场机会拓展创造转型拉力

交易成本下降提供了推力，市场空间的拓展则构成了转型拉力。传统贸易受制于地理距离、信息不对称和渠道壁垒，义乌商户的海外市场覆盖范围有限。数字贸易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格局，电商平台将义乌商品直接推送到全球消费者面前，精准营销和算法推荐使此前难以触达的长尾需求被有效激活，跨境直播和社交媒体则创造了全新的获客场景。

义乌商户对市场机会的捕捉，集中体现在市场布局的多元化。传统贸易阶段，义乌小商品主要销往周边国家和欧美市场；数字贸易兴起后，商户借助电商平台和直播工具，将销售网络扩展至全球。2024年，义乌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进出口额占比达到61.8%，对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的出口增速远超传统市场，部分国别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50%[11]。在全球数贸中心，义乌商户通过TikTok、亚马逊等平台的直播带货，单场活动即可触达数十万海外消费者。

3.经营主体主动变革使转型成为现实

成本下降和市场机会提供了转型的经济激励，但这些激励能否转化为实际行为，最终取决于义乌商户的能动性。数字化转型并非被动接受外部技术注入，而是需要义乌商户主动投入资源、习得新技能、调整组织架构并持续试错迭代。在义乌，商户群体展现出高度的学习意愿与创新活力，形成了“不转型即被淘汰”的市场选择机制。数字贸易的转型并非一次性技术替代，而是一个持续的、探索性的演化过程，义乌商户需要在实践中掌握新工具、适应新规则、解决新问题，不断调适经营策略与组织方式。这种“干中学”过程使义乌商户的个体经验得以积累、能力得以提升，形成自我强化的正反馈循环。

在数字贸易迭代升级的不同阶段，义乌商户始终保持主动转型的内生动力。电商发展初期，行业缺乏成熟运营范式，义乌商户自主摸索线上运营、跨境对接等基础业务，逐步适应数字化贸易规则。直播电商兴起后，义乌商户主动更新营销方式，依托短视频、直播等数字化渠道拓展客源，打破传统线下获客局限。伴随人工智能技术普及，义乌商户

积极运用数字化智能化工具解决实际问题。长期的实践积累，让义乌商户沉淀出市场研判、供应链整合、需求洞察等核心经营能力。面对转型过程中的各类经营难题，义乌商户主动调整经营策略、自主破解发展瓶颈，不单纯依赖外部扶持。这种根植于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是义乌数字贸易持续迭代与不断深化的微观基础。

（三）制度适配机制

各级政府围绕义乌的数字贸易转型推动改革创新，明确数字贸易转型方向，破解传统贸易制度同数字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的适配性矛盾，引导市场主体主动拥抱数字化转型，协助商户解决数字贸易转型中的痛点难点，为义乌数字贸易转型提供稳定、高效、可落地的制度保障。

1.政策导向为数字贸易转型指明方向

市场主体的数字化转型意愿不仅取决于技术是否可行、利润是否可期，而且取决于政策环境是否稳定、方向是否明确。如果政策信号模糊或频繁变动，商户可能倾向于观望而非行动。各级政府通过战略规划、试点授权和制度承诺，为义乌各类市场主体转向数字贸易提供了清晰的预期。

2011年，国务院批准义乌开展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这是全国首个由国务院批准的县级市综合改革试点，赋予义乌在通关、外汇、税收等领域先行先试的制度空间。2018年，义乌获批国家级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政策重心进一步向跨境电商和数字贸易倾斜。2024年底，国务院批复《浙江省义乌市深化国际贸易综合改革总体方案》，提出5个方面改革任务、97项具体改革举措，明确在完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推动完善跨境电商规则、创新支持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先行先试。该方案明确提出聚焦数字贸易，做好“平台打造+市场培育+模式创新”的文章。浙江省政府把深化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作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的重要举措，并列入省委与国务院协调推进的重点工作。义乌制定《义乌市加力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4—2027年）》等配套文件，形成从国家战略到地方落实的完整政策链条。这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叠加，向市场传递了清晰信号：数字贸易是义乌长期坚持的方向，政策将持续加力而非收缩，这为市场主体向数字贸易转型指明了方向。

2.监管创新为数字贸易转型破除障碍

政策导向回答了“往哪儿走”的问题，但商户在实际经营中仍然面临一系列具体的制度障碍。碎片化订单找不到合规的出口通道，跨境收汇缺乏便捷的支付渠道，数据流动面临法律监管的空白地带。这些制度障碍如果不能有效破除，数字贸易就难以真正落地。在义乌数字贸易转型过程中，政府以监管创新回应义乌市场主体在实践中暴露的制度需求，通过创设新型贸易方式和跨境支付渠道、完善数据流动与合规规则，降低义乌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让数字贸易从“先行先试”走向“有章可循”。

2013年3月，商务部等八部委在义乌首创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制定了针对多批次、多种类、小批量无票货物的贸易便利化政策。2014年7月，海关总署正式增列“1039”监管代码，该方式从此纳入国家海关监管体系。2018年八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工作的函》，进一步明确在全国范围复制推广义乌经验。经过十多年探索实践，义乌首创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已在全国39个城市推广，成为国家稳外贸的重要制度工具。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解决了货物出口的合规通道问题，但随着数字贸易向纵深发展，数据跨境流动、支付结算、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规则空白同样需要被填补。2024年底，国务院批复《浙江省义乌市深化国际贸易综合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在数据流动、商品溯源、电子签名、争端解决、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融。在义乌数字贸易转型过程中，政府监管创新一以贯之的逻辑是，不以既有制度框架对新业态进行规制约束，而是依据新业态的运行特征推动制度更新，使数字贸易的链条能够畅通运转。

3.服务优化为数字贸易转型营造生态

数字贸易的持续运行，既依赖稳定的政策预期、顺畅的合规通道与必要的要素供给，也离不开便捷、透明、高效的政务服务环境。对义乌商户而言，行政审批流程的繁简程度、政策信息的可及性以及纠纷解决的时效性，直接构成其参与数字贸易的交易成本。在传统行政服务模式下，商户办理一项涉外业务通常需要经过多部门、提交多套材料，耗时数周。这种分段式、分散化的服务供给模式，与数字贸易高频、快速、跨境化的运行节奏之间存在显著的制度性摩擦。降低此类摩擦成本，本质上

是对数字贸易转型的制度性支撑。

义乌早在2012年就依托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整合14个涉外职能部门与4家社会服务机构，在全国率先设立了国际贸易服务中心，把涉外政务服务直接搬进国际商贸城。为了推进政务服务便民化，义乌政务服务中心窗口从324个整合优化至50个，全面实现“一窗通办、综合受理”，涉外事项的办理时长普遍压缩70%以上[12]。在此基础上，2025年义乌进一步整合法务、政务资源，以国际商贸城四区为核心建设国际贸易法务集聚区，汇聚知名律所、金融机构、金融法庭等28家法务政务单位，企业设立、商标注册、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出口通关等高频事项均可在此“一站式办理”。此外，义乌还通过跨境贸易合规化服务平台和涉外商事调解服务网络，以法治化手段为数字贸易转型提供高效便捷的纠纷解决机制。义乌上线的浙江省首个服务于跨境电商企业的跨境贸易合规化平台，通过大数据技术和AI算法整合全球法规数据、贸易数据、税则数据等，归集合规规则数据23.68万条，为出口企业提供智慧税则、智慧合规、智慧享税等查询和预警服务[13]。从集成审批到服务下沉，从数字合规到涉外调解，义乌通过政府服务体系的系统再造，让商户“办事不出市场、诉求有处可诉、合规有路可循”，形成了支撑数字贸易持续运转的优良生态。

五、义乌数字贸易转型的经验启示

数字贸易作为数字技术与国际贸易深度融合的新形态，正展现出强大韧性与增长潜力，加快发展数字贸易是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背景下的战略选择。近年来，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势头强劲，数字化交付的贸易规模持续扩大，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屡创新高，各地纷纷把数字贸易作为培育外贸新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然而，受制于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制度创新等因素，多数地区在推动传统贸易转向数字贸易的过程中面临路径不清、动力不足等现实问题。义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始终锚定“兴商建市”发展战略，持续推动商贸平台迭代升级，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成功实现了从传统贸易到数字贸易的系统性重塑。义乌商贸平台的迭代升级和数字贸易转型实践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义乌数字贸易转型实践充分证明，发展数字贸易并非单纯的技术升级，也不是孤立的政策推动，而是经营主体、市场机制与政府治理三者协同发力的系统工程。义乌数字贸易转型的实践经验，为全国其他商贸城市突破发展瓶颈、推进数字贸易转型提供了宝贵启示。

（一）经营主体适应数字贸易转型

发展数字贸易的微观基础在于经营主体主动作为，数字贸易时代要求经营主体从传统的执行者转变为学习者、创新者和风险承担者。数字贸易的技术工具、平台规则和商业模式的迭代速度远超传统贸易，算法推荐、跨境直播、AI客服、区块链溯源等新技术层出不穷，短期培训难以适应持续变化，这就要求各类经营主体提升自主学习能力，在真实场景中持续试错、迭代，将碎片化的使用体验转化为组织层面的隐性知识和可复用能力，通过主动适应和拥抱数字贸易而做大做强。在义乌数字贸易转型过程中，义乌商户顺应电商、直播、智能化多轮业态更迭，摸索平台运营、AI工具实操路径，持续打磨数字化本领，这为其他地区的经营主体主动适应数字贸易转型提供了参照。

此外，经营主体需要提升创新能力与风险抵御能力。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海外需求、国际贸易规则不断变化，导致数字贸易的创新要求和失败风险更高。经营主体应当主动跟踪国际市场动态，借助数字化手段挖掘细分市场需求，结合自身产品禀赋持续优化产品设计与营销方式。同时，经营主体应理性看待转型试错成本，主动调整经营策略，依靠创新化解外部环境波动带来的经营风险，筑牢数字贸易转型的经营能力基础。义乌商户在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环境中形成了主动应变的经营思维，主动适应数字贸易转型浪潮，依托数字渠道拓展新兴市场，以数字贸易创新对冲外部经营风险，这值得其他地区的商户学习。

（二）有效市场引导数字贸易转型

有效市场是引导数字贸易转型的无形之手，其核心功能在于让价格信号、竞争机制与创新激励充分释放，通过削减不必要的进入壁垒、打通数据流动梗阻，引导各类市场主体依据比较优势自主决策，从而顺利实现数字贸易转型。

一是充分聚合产业资源。数字贸易要求打破传统产业边界与地域分割，借助数字平台与供应链

系统将生产、物流、营销、服务等环节高效链接，推动大中小企业跨界协同、产业链上下游深度融合，形成规模经济与集群优势。市场通过优胜劣汰将优质要素向高效率企业集中，实现产业资源的优化重组与协同创新。义乌正是依托实体市场形成产业集聚优势，以Chinagoods数字平台串联工厂、商户、物流服务等全链条主体，有效整合产业链，创造出巨大的发展动力。

二是积极拓展国内外市场。数字贸易突破了地理与渠道限制，市场可以充分发挥其开拓与匹配功能，引导企业利用跨境电商平台、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及海外仓体系，直接触达全球消费者，挖掘长尾需求与新兴市场机会。与此同时，市场可以引导商户推动内外贸一体化，既深度拓展国内统一大市场，又积极融入国际循环，从而扩大贸易规模与市场份额。义乌凭借实体市场积累和数字化平台搭建起多渠道出海生态，依托平台互联、海外仓共建、多式联运等方式引导商户自主开拓全球多元市场，打通了内外贸流通渠道。其他地区可以借鉴义乌经验，依托市场化载体打通线上线下流通壁垒，引导市场主体灵活运用多元数字化渠道深耕海内外细分市场，依托内外贸双向联动持续拓宽贸易发展空间。

三是高效配置资源并激发创新活力。数字贸易催生了对数据、算法、数字人才等新要素的需求。市场需通过真实的价格信号引导要素流动，以竞争机制实现优胜劣汰，激励企业改进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升服务水平。与此同时，数字贸易为创新创业提供充分的回报预期，降低试错成本，推动商业模式、产品形态与贸易业态的优化升级，从而形成数字贸易持续迭代的内生动力。义乌依靠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引导数据、技术、人才等新型要素向优质经营主体集聚，以市场化收益反哺商户持续开展产品与业态创新，培育出了数字贸易创新土壤，这为义乌推进数字贸易转型提供了内生动力，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借鉴。

（三）有为政府保障数字贸易转型

有为政府是实现数字贸易转型的重要保障，关键在于把握好“有为”与“有效”的边界，在数字基础设施供给、跨境数据流动便利化、数字贸易规则治理等方面精准发力，同时充分尊重市场规律与个体创造力。唯有如此，才能形成政府有效引导、市场充分竞争、经营主体积极作为的协同局面，推动实现数字贸易转型。

一是保障数字要素供给。政府应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包括5G/6G网络、数据中心、跨境光缆等），构建开放兼容的数字平台体系，加大数字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形成“硬设施+软平台+人才”的要素协同供给体系。只有要素供给充足且高效流动，经营主体的创新活力才能充分释放。义乌政府统筹规划数字基建，扶持本土数字平台，配套出台专项人才引育政策，为数字贸易转型发展提供了动力。

二是推进数字贸易便利化改革。政府应优化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简化通关和支付结算流程，推广海外仓和保税仓建设，支持中小企业利用数字平台“出海”。政府改革创新数字便利化的相关制度，可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经营主体“愿意转、容易转”。义乌依托国家级跨境电商综试区、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身份，创新市场采购贸易、无票免税、离境即退税等制度创新，搭建一站式涉外政务服务中心，依靠制度创新持续压缩商户出海合规成本，为数字贸易转型发展注入活力，这值得其他地区学习借鉴。

三是完善数字治理体系。数字治理体系建设需兼顾安全与发展、国内规则与国际对接，这构成了数字贸易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石。一方面，要健全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完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个人信息保护认证和标准合同等机制，在保障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安全的前提下，促进数据跨境有序、高效流动。借鉴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试点等创新实践，有助于降低企业合规成本，为数字贸易提供制度红利。另一方面，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厉打击数字领域的侵权行为，完善数字产品和服务的版权、专利确权与维权机制，激发创新创造热情。义乌率先落地商贸数据空间建设规范，以精细化治理平衡数据开放与行业安全，这为推动数字贸易转型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注释

①《浙江义乌：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中国广播网，https://www.cnr.cn/2008zt/ggkf/tpbd/200810/t20081029_505136662_7.html，2008年10月29日。②《义乌市场建设40周年系列综述（一）（1982—1991）》，义乌市场发展研究院，http://yimds.cn/news/attention/t101778.html，2022年12月12日。③《国际商贸城》，义乌市人民政府网，https://www.yw.gov.cn/art/2021/1/21/art_1229137473_50623531.html，

2021年1月21日。④《数字义乌——2010义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概况》，义乌市人民政府网，https：//www.yw.gov.cn/art/2011/3/10/art_1229137466_50692855.html，2011年3月10日。⑤《2015年义乌电商交易额达1511亿元 同比增长31%》，中国新闻网，https：//www.chinanews.com.cn/m/cj/2016/01-21/7726882.shtml，2016年1月21日。⑥《义乌电子商务发展指数报告2015》，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https：//www.caitec.org.cn/upfiles/file/2017/4/f55a75c3-072d-4759-a407-afc580042995.pdf，2016年4月。⑦《从“实体市场”到“数字贸易生态”一个平台的全球链接》，中国义乌网·义乌商报，https：//news.zgyww.cn/system/2026/04/16/010300315.shtml，2026年4月16日。⑧《商城集团海外仓布局》，义乌小商品城，https：//www.chinagoods.com/international/worldmap。⑨《中国电信助力浙江义乌打造数字贸易新生态》，人民网，https：//zj.people.com.cn/n2/2026/0424/c370990-41562060.html，2026年4月24日。⑩《“探索数据要素赋能小商品数字贸易便利化”入选首批20个“数据要素×”典型案例》，义乌市人民政府网，https：//www.yw.gov.cn/art/2024/6/4/art_1229794134_59481791.html，2024年6月24日。⑪《提升竞争力 拓展全球市场——“世界超市”义乌新观察》，中国一带一路网，https：//www.yidaiyilu.gov.cn/p/0IM14SM0.html，2025年4月19日。⑫《走进义乌市国际贸易服务中心，感受涉外业务办理之便——集成赋能 下沉一线》，浙江日报，https：//zjrb.zjol.com.cn/html/2026-05/04/content_3900811.htm，2026年5月4日。⑬《制度创新 义乌跨境贸易合规化平台助力跨境电商“以法为帆 品牌出海”》，金华市商务局，http：//swj.jinhua.gov.cn/art/2025/8/1/art_1229713495_58925912.html，2025年8月1日。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 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N].人民日报,2026-04-24(001).

[2]钞小静,薛志欣,孙艺鸣.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如何影响对外贸易升级:来自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J].经济科学,2020(3):46-59.

[3]侯俊军,王胤丹,王振国.数字贸易规则与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J].中国工业经济,2023(4):60-78.

[4]朱勤,周祥祥.数字贸易发展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J].世界经济研究,2024(4):105-115.

[5]姚战琪.数字贸易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多重中介效应[J].贵州社会科学,2024(2):127-136.

[6]伍先福,段步婧.数字贸易能提升产业链韧性吗?[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5,27(3):20-38.

[7]马野青,倪一宁,黄涵宁.数字贸易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构建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24(5):144-152.

[8]孔希贤,郎丽华,王钰良.数字贸易对中国经济韧性的影响: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国际经贸探索,2024,40(5):20-39.

[9]张东明,李化营.数字服务贸易发展对全球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与作用机制[J].亚太经济,2025(1):136-151.

[10]郑佳宁,聂昀秋,马晓君.数字贸易对新型城镇化优化布局的影响与机制[J].中国流通经济,2025,39(2):60-72.

Digital Trade Transformation Practices and Enlightenments in Yiwu'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Wang Songji Li Tong

Abstract: The Yiwu Development Experience, which features the expansion of petty commodities into a massive market and robust industrial cluster, represents a proven model for county-level economic development tailored to local realities. In particular, Yiwu's transformation from conventional trade toward digital trade offers valuable referential implications for peer region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of Yiwu's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platform and dissects it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ractices across three core links: trade matching, transaction fulfillment and auxiliary trade services. It further distills three underlying driving mechanisms for digital trade transition, namely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market-driven selection and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Yiwu's practical progress reveals that digital trade advancement goes far beyond mere technological substitution; instead, it hinges on in-depth integration between physical market foundations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 alongside systematic restructuring centering on proactive adaptation of business entities, resource allocation via efficient markets and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enabled by well-targeted government governance. Relevant insights derived from Yiwu's experience can inform locally customized digital trade development pathways across other regions.

Key Words: Yiwu Development Experience; Digital Trade; Digital Economy

（责任编辑:文 锐）